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口 地区分布的变动

张善余

【提要】 1959~1961年间由于重大政策失误等原因,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人口减少,人口分布出现了不正常的显著变动。本文对该时期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形势,尤其是粮食生产和供应形势,以及与此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迁移,进行了定量的差异分析,总结了中国人人口分布的变动特点,并简要评价了这种变动的社会经济意义。

【作者】 张善余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后一段时间重大的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使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此后人们常把1959~1961年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该时期内全国人口蒙受很大损失,人口地区分布也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的显著变动。本文拟针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动进行研讨。城乡人口的变动也属于人口分布问题,但受文章篇幅所限,本文中不予讨论。

一、暂时经济困难对不同地区经济形势的影响

1959~1961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遭遇了罕见的挫折,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滑坡,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59年下降了32%^①,其中粮食产量与1958年相比,1959年减少15%,1960、1961两年减幅更高达28%左右,从而造成了人口总量锐减等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应该指出,粮食生产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巨幅的下跌,除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在现代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例如,美国在1986~1988年间也曾连续3年粮食减产(世界粮农组织,2000),但最大跌幅不超过14%,且属于过剩下的减产;在人口多、幅员广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和巴西粮食生产的最大跌幅为5%,印度尼西亚则仅为2%;就新中国自身而言,除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粮食产量的最大跌幅亦仅为6.9%。由此足以反映这次经济困难和粮食大减产的极端严重性。

虽然这次暂时经济困难是全国性的,但不同地区之间在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仍有很大的差异。国民经济的下降除安徽、湖北、广西、四川地区早在1958年即已开始外,大部分地区开始于1959年或1960年,并于1961年或1962年跌至谷底(仅河北、湖南两地直到1963年才见底)。其下降幅度以云南的18%为最小,江西、江苏的20%次之,其他地区则普遍为1/4、1/3或1/2,辽宁省竟超过60%。就全国而言,相对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50%~70%的巨大跌幅,农业生产仅下降了26%。然而,“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产量及供应水平在当时情况下对中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态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下面着重从粮食产量变动和人均占有水平对除北京、上海、天津和西藏以外的各个地区进行分析。

粮食生产形势稍好的地区,包括江西、内蒙古、云南、吉林、黑龙江、新疆和浙江,人均粮食产量

^① 本文中的统计数据除另有注明外,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跌到谷底时仍达到 250~300 公斤,折合成品粮每人每天不少于 0.5 公斤,大体上可以满足最低生理需求。1960 年前后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也出现了下跌,但跌幅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西、云南和新疆是除西藏(不降反升)外各地区中跌幅最小的。黑龙江、内蒙古等下降幅度虽然不小,但原有基数大,大幅下降后在国内仍居上游。上述各地区绝大部分都属于前一阶段农业生产发展较快、耕地增加较多的人口导入区,无论就增产粮食还是减轻其他地区人口压力而言,在经济困难时期都对国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粮食生产形势较差的地区,包括广东、湖北、广西、宁夏、湖南、江苏、福建和山西,人均粮食产量跌到谷底时在 200~235 公斤之间,折合成品粮每人每天不足 0.5 公斤,已出现明显的营养匮乏,其中部分地区达到严重的程度。上述地区原有的人均粮食产量在国内属中下水平,但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农业减产的幅度一般略低于平均水平,因而未成为“重灾区”。

粮食生产形势很差的地区,包括安徽、陕西、海南、贵州、四川、甘肃、山东、河北、河南和辽宁,除安徽外,人均粮食产量跌到谷底时仅为 142~192 公斤,折合成品粮每人每天远不足 0.5 公斤,已属于全局性的严重营养匮乏。上述地区的粮食产量在 1960 年前后都发生了大幅下降,短短两三年内,四川和辽宁的粮食总产量下降了 48%,河南下降 46%,甘肃下降 43%,贵州下降 40%,已明显低于甚至大大低于 1949 年,按人口平均比 1949 年则差得更多。安徽与其他地区相比有一点特殊性。安徽 1961 年人均粮食产量跌到谷底时为 208 公斤,但作为主粮的稻谷和小麦与农业生产连续大滑坡前的 1957 年相比,下降幅度极大,完全依赖甘薯等杂粮才减小了粮食总产量的跌幅;但甘薯营养价值不高,且折算为粮食产量时有一定的“水份”(1964 年前 4 折 1,此后为 5 折 1)^①,因此,将其列入粮食供应困难的地区并不为过。

二、经济困难对不同地区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迁移的影响

暂时经济困难造成的最严重、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口出生率锐降、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人口总量的负增长。据《中国人口年鉴》数据,1959、1960、1961 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10.19‰、

表 1 1960 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粮食生产形势

地区	粮食产量 变动(%)	人均粮食产量(公斤)			地区	粮食产量 变动(%)	人均粮食产量(公斤)		
		1958 年	1961 年	变动			1958 年	1961 年	变动
河北	-29.3	226.3	156.4	-69.9	湖北	-25.6	318.1	231.8	-86.3
山西*	-27.1	288.3	200.1	-88.2	湖南*	-34.6	337.4	221.0	-116.4
内蒙古	-28.7	502.1	292.3	-209.8	广东*	-16.6	292.4	235.8	-56.6
辽宁*	-48.6	289.3	142.3	-147.0	广西*	-15.1	270.5	227.2	-43.3
吉林*	-25.4	418.2	256.5	-161.7	海南*	-22.7	262.1	191.3	-70.8
黑龙江	-45.9	577.2	256.0	-321.2	四川	-48.6	442.5	176.6	-265.9
江苏	-19.9	267.4	212.9	-54.5	贵州*	-39.8	309.6	186.7	-122.9
浙江	-17.1	311.4	248.9	-62.5	云南*	-10.0	285.5	257.1	-28.4
安徽	-28.9	262.8	208.6	-54.2	陕西	-26.8	282.5	192.2	-90.3
福建	-27.4	302.5	204.1	-98.4	甘肃	-42.6	268.0	158.9	-109.1
江西*	-8.5	352.0	304.2	-47.8	青海	-33.1	272.4	170.2	-102.2
山东*	-32.3	227.1	157.1	-70.0	宁夏*	-32.9	373.3	221.3	-152.0
河南	-45.9	258.5	142.3	-116.2	新疆	-11.0	344.0	249.9	-94.1

* 为 1958~1960 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

① 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 416 页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4.57‰和3.78‰,3年总人口净减135万。如果根据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回溯,分别约为9.8‰、-26.6‰、-5.0‰,净减1486万人(许涤新,1988)。与50年代中期自然增长率20‰~24‰的正常水平相比,负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但此种变动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据统计,50年代中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地区差异相对于解放初期显著减小,1957年标准差仅为5.30(千分点),但此后即逐年扩大,1958年为6.62,1959年为9.85,而1960年竟跃增至20.91(见图1),正是这种差异成为影响期内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

根据1960年前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可以把除西藏以外的各个地区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自然增长率显著下降,但仍为正数

这类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江西、陕西和新疆,合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其自然增长率降至最低时除少数地区在7‰左右外,一般都高于10‰,与前期正常水平相比,大约降低了1/2~2/3,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升高均尚属温和。此类地区中的3个老直辖市在粮食供应上可能多少受到国家的一点“照顾”,其他地区大部分拥有较充裕的土地。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在全国居于最前列,浙江、福建两地特别是其民间,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毗邻江西这一相对的粮食富裕区,均增大了承受能力。

(二) 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与零增长和负增长仅咫尺之遥

这类地区包括河北、广东、江苏和宁夏,合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其中宁夏类似于内蒙古和新疆,尚有一定的土地承载力的基础;其他三地均位于东部沿海,属经济大省,工业较发达,且毗连北京、天津、上海或香港地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因素均有助于减轻损失。

(三) 自然增长率巨幅下降,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这类地区包括除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十几个地区,其人口合计占全国的57%。这些地区的人口负增长一般持续约1年,湖南、广西、贵州和青海为2年,四川则长达3年。负增长的幅度以1960年安徽省的-57.2‰和四川省的-42.24‰为最大。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些统计数据(部分已经过调整)所反映的更严重。如安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为3004万,而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11岁及以上人口只剩下大约2240万,11年中的损耗率超过25%,远远超过年均1%左右的正常损耗率,超出部分实际上都集中在1958~1961年的3~4年内,由此推计,负增长率将比统计数高得多。当然其中包括了一部分省际迁出,但考虑到当时周边地区的情况(除江西省和浙江省外,安徽邻近各省全部出现负增长或零增长),迁出数不可能很大,大部分仍属于自然损耗。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少地方生产力的大滑坡,特别是粮食的极端匮乏及其所造成的人口大量不正常死亡,引发了巨大规模的逃荒性人口迁移。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和1960年中国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合计的迁移总量分别为6005万、6515万,比正常水平的1957年增加了670万和1180万。全国旅客周转量的激增也反映出人口的大流动:“大跃进”的1958年为572亿人公里,而1959、1960和1961年竟分别激增至712亿人公里、883亿人公里和1105亿人公里,增加幅度依次为25%、54%和93%,其中1961年的水平直到10年后才重新达到,由此足以反映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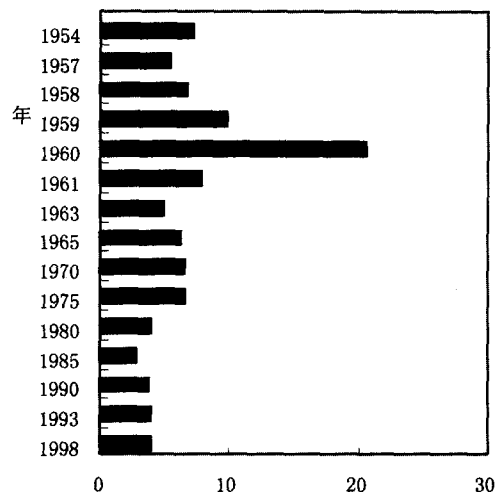


图1 按地区计算的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标准差
注:未包括西藏自治区;重庆市和四川省合并计算。

大滑坡下人口迁移流动激增的不正常。

农民大量外流逃荒无疑增大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引起了政府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对大量的外流逃荒严加劝阻。1959年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即要求在农民盲目外流严重的地区,必要时应在交通要道派人进行劝阻,对已经流入城市、工矿区而未找到工作的农民,应组织临时工作机构负责收容和说服动员,尽速遣返原籍。为此,各地都普遍成立了劝阻农民盲目外流办公室、收容站、遣送站等,但直到1962年夏秋,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形势稍有好转,外流强度才有所减弱。

由于户籍登记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尤其是在边远的农村和山区),以及一些地区为粉饰太平,把一部分死亡人口报为迁出人口(翟松天,1989),因此有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地区人口迁移的现有统计数据不太准确。表2的数据来源于户籍统计,其中问题显然不少,然而,要对各个地区的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进行逐项的修正,在定量上又缺乏足够的依据。因此,以下主要还是用户籍统计的数据对各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大部分地区而言,误差应该说不会很大。

表2 1959~1961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排序 %

地区	纯增率	自然增长率	迁移增长率	地区	纯增率	自然增长率	迁移增长率
新疆	70	13	55	浙江	7	12	-4
黑龙江	67	19	46	河北	4	6	-1
内蒙古	57	18	37	湖北	3	8	-5
北京	45	20	23	江苏	-1	4	-5
吉林	34	17	16	云南	-3	3	-6
陕西	28	14	13	广西	-4	-2	-2
海南	26	12	14	河南	-10	1	-10
天津	23	15	7	山东	-10	-2	-7
福建	23	12	11	湖南	-15	-1	-14
上海	21	19	2	贵州	-16	-3	-13
江西	19	12	7	青海	-19	-8	-11
山西	18	12	7	甘肃	-25	-7	-19
宁夏	18	4	13	西藏	-38	—	—
广东	12	9	3	四川	-38	-31	-8
辽宁	9	12	-3	安徽	-43	-17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这几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前期相比下降相对温和,而人口的迁入则十分强劲。这既与土地和经济承载力有关,又受前期大移民引发的“链式迁移”作用的影响。

据统计,新疆在上述3年中合计净迁入96万人,相当于1958年全自治区总人口的16%,其中建于1954年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占了很大比重,1958年兵团总人口为38.5万,到1962年已猛增至86.2万,增量中大部分属于外来移民。

1959~1961年黑龙江省净迁入人口高达236万(同期自然增长人口仅为97万),数量之大在该省历史上是空前的。除了因粮食相对富余吸引了大量外省自发性的逃荒农民外(1959年仅流入哈尔滨市的外省农民就多达13万余人),政府为进行重点建设而组织的计划性移民规模也不小,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少见的。如1960年大庆油田大会战,7万多人从全国各地“万里赴戎机”;此外,前往大兴安岭林区、北大荒各农场以及几大煤矿的移民也很多,1959年仅牡丹江和合江两大农垦局就从山东省吸收了5万多支边青年。

根据表2数据,1959~

1961的3年中全国有18个地区总人口保持增长,其中湖北、河北两省增幅很小,可以认为是零增长,其余地区基本上都属于前一阶段全国的人口高速增长区及主要的人口迁入区,它们的粮食生产或供应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好的(由于国家对赏品粮的调拨和自国外的进口,一个省的粮食产量和供应量并不相等),这一点通过表1与表2的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等地区仍延续前9年的势头,人口大幅增长,在全国范围内也显得非常突出。这

1959年和1960年向内蒙古的移民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两年净迁入共162万人,相当于自治区总人口的16%。期内包头钢铁公司等重点工程进入了投产期,职工大量迁入,1960年包头市人口已接近百万,比两年前猛增了0.5倍以上。而逃荒型农民流入的规模则更大,仅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得到政府安置者就多达70万人,他们大部分来自河北、山西、山东、辽宁等省。

1959和1960年北京市为了建设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再加上“十年大庆”等因素,人口也出现了高速度增长,两年增加了100万人,其中净迁入70万人。这种强劲势头明显脱离当时全国总的经济形势,1961年开始大调整后,北京市无论人口总量还是人口迁移都出现了负增长。

1959~1961年,全国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总量减少,它们多是名列前茅的人口大省,从而对全国人口态势和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负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安徽、四川、甘肃、青海和贵州省。

1959~1961年,安徽省总人口共减少约460万,减幅超过13%,其中以阜阳、宿县、六安、巢湖、宣城等几个地区最为严重。人口的减少主要集中在1960年,一年内全省减少了360万人,减幅高达10.5%。据估计,这一年约有近100万农民外出逃荒(郑玉林,1987),以此推计,人口自然减耗在260万以上,自然增长率为-80%(报表统计数为-57.2‰)。

四川省一向被称为“天府之国”,农产品相当丰富,直到1958年人均粮食产量在全国仍高居第三位,粮、油、肉、果等大量外调。但此后农业生产即大幅滑坡,3年中粮食减产了一半,减幅是全国最大的,加上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向外省调运粮食(1959年与1958年相比,在全省粮食总产量暴跌30%的情况下,粮食收购量仍增长20%),结果酿成大灾荒,且持续时间很长,致使人口遭到严重损失。据统计,仅1960和1961两年,全省就减少了大约900万人,减幅达12%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自然减耗,省内的涪陵、乐山、万县、达县等地区损失尤为严重。

青海、甘肃两省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初期移民大量迁入,人口发展速度位居全国之前列。从1959年起粮食连续几年大幅度减产,按人均粮食产量降至全国最低水平,由此导致严重的人口负自然增长,移民也出现大退潮。如青海省1961年净迁出37万余人(报表统计数,可能偏高),竟相当于全省总人口的15%。迁出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前几年从外地移入的农业垦荒型移民,由于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不具备大规模垦殖的条件,很多地方种下庄稼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致使这类垦荒型移民基本上全部以失败告终,不仅虚掷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严重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甘肃省在1960~1961年也有几十万人迁出,除前期移民纷纷返回外,该省不少地方也有许多农民为逃荒而流向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地区。此外,为解决城市人口缺粮问题,政府还动员干部职工到外地“以工就食”。到1961年底,青、甘两省总人口分别比1959年下降了18.7%和9.4%。

贵州省在旧社会被称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中国有名的穷省,解放后情况有很大改善,但从1959年起也遭遇到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因底子薄,交通闭塞,损失更加严重,1961年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7%,这些损失主要集中在遵义、毕节地区和黔东南自治州等地,其中湄潭县、金沙县等是全国突出的“重灾区”。

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再生产和人口迁移态势均发生了急剧变动,其幅度或强度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变化也不小的最初9年。在一部分地区继续保持人口高速度增长的同时,另一部分地区却出现了深幅的负增长,地区差异迅速扩大。1949~1958年间,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最低的地区之间相差3.82个百分点,而1959~1961年间竟增至11.47个百分点;全国人口再分布指数达到了近几十年的最高峰值(见图2),比解放初期增长大约1倍,比50年代中期增长了近2倍。这些都促使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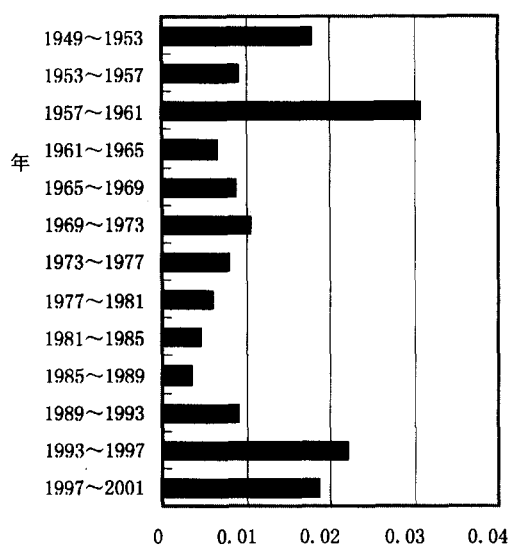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人口再分布指数的变动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分布格局变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北方地区人口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北京、吉林和陕西竟囊括了全国人口增长率的前6名,这6个地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58年的10.4%锐增至1961年的12.0%。此外,位于北方的天津、山西、宁夏、辽宁和河北等地区的人口比重也小有上升。另一片人口发展较快的地区位于国土的东南部,包括海南、福建、上海、江西、广东和浙江6个地区,1958年这6个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16.2%,1961年已增至17.0%。

位于以上北部和东南部之间的广大地区,在经济困难时期都承受了比较严重的人口损失,出现过一到几年的人口负增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如安徽省1958年占5.2%,1961年仅占4.5%。

由于期内全国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位于北部尤其是东北部,以及东南部,因此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出现了向东北方向的快速移动,1958年该重心位于东经113°50',北纬32°28'17",而1961年已到达东经114°,北纬32°38'38",短短3年时间内向东移动了10',向北移动了10'20",平均每年向东北方移动达8.1公里,速度比人口再分布相当活跃的1949~1958年间的1.8公里快了3倍多。

与前一阶段一样,1959~1961年间对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动起到了基本制约作用的依然是土地的粮食承载力,其作用强度甚至变得更大了,这一点从相对于土地面积的全人口集中指数上可以看得很清楚:1958年该指数为0.5310,1961年已降至0.5238,年均下降速度比前9年整整快了1倍。人口再分布显著缩小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地区差异,除3个老直辖市和西藏外,1958年各地区人均粮食产量的标准差为83(公斤),而1961年仅为44。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期内中国人口分布在前一阶段已明显趋于均衡化的基础上,又走向更大程度的均衡化,以获得人与土地或粮食承载能力之间的最低限度的平衡,充分显示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处在能否维持人的生理存在的这样一条临界线附近,其他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都是十分次要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各年。
2.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各年。
3.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4.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6. 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丛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7. 郑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丛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8. 世界粮农组织(FAO):《生产年鉴》,2000年。

(责任编辑: 朱 萍)